

---

# 亚太秩序转化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方向

钟飞腾

**【摘要】** 本文旨在讨论未来十年亚太国际秩序调整的动力和演进方向。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秩序发生过三轮大的调整，第一轮调整是美苏战略失衡引发推动中国与美日同盟关系的和解，是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再平衡；第二轮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日本在经济上挑战美国主导地位，是一种基于共同安全框架的经济调整；最近这一轮亚太地区秩序的调整直接起因于中国崛起，有可能改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一方面，此次秩序的调整是在和平发展成为全球秩序转换动力的背景下发生的，美国难以用战争手段解决权势转移问题；另一方面，这一轮调整是在前两次的基礎上发生的，结合了地缘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国际社会普遍以中美力量对比来推导未来的地区秩序，认为出现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两个亚洲”，但这一说法更多是对未来的推测，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中美尽管对未来亚太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但区域内其他国家更希望看到一种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形成一个开放性的地区秩序。

**【关键词】** 地区秩序；亚太；两个亚洲；中美关系；开放性地区主义；功能性合作

**【作者简介】**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Order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By Zhong Feiteng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dynamics and evolutionary wa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order. In general, there have been three waves of regional order change since the 1970s. The first kind of regional order adjustment was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Japan alliance, which was a geopolitical arrangement driven by the strategic imbalance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second one took place in the late 1980s with the rise of Japanese economic pow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succeeded in persuading Japan to

---

upgrade the U.S.A.-Japan alliance without any great change in the regional order. The most recent regional order adjustmen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initially emerged due to the quick and continuous rise of China. Due to the great scale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rise of China, Asia-Pacific regional order adjustment might change the global order in the near fu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third wave of regional order adjustment is driven by peaceful dynamics, and the current American hegemony cannot contain China's rise through military for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 regional order is directl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its two predecessors and tries to combine geopolitical balance with geo-economics. Focusing on the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many believe that regional order has disintegrated into "two Asias", with China domin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ing security order. However, this kind of judgment is not a reality but merely speculation. Althoug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ertainly play the greatest roles in future regional order formation, other regional countries still have their positions in the new regional order. The ideal regional order model in their minds is a much more balanced and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not a conflictual and divided one. Moreover, an open regionalism may help them to play a functional role in regional order.

**【Key Words】** Regional order, Asia-Pacific region, two Asias, Sino-U.S.A. relationship, open regionalism,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uthor】** Zhong Feite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国际秩序从来都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议题。这不仅是因为特定的国际秩序代表着稳定的权力格局和规范国家间行为的规则，也因为秩序一经生成就将延续一段时期，对处于体系之内的国家将产生持久的影响。在亚太地区，历经数次较大的地区性秩序变革，地区内的国家各有不同的反应和命运，中国经历了帝国的瓦解和新中国的诞生，但目前依然处于海峡两岸不统一的状态；日本从成功融入西方到二战战败，在战后又重新崛起为经济强国；朝鲜半岛在经历被殖民、亡国之后，最终分裂为两个国家，迄今也没有签署国家间和平条约；东南亚的国家也经历了被殖民，在二战结束后获得民族国家的独立，到现在走向一个东南亚联盟的进程中。

在这些秩序的转变中，多数时候地区性国际秩序被更大范围、更大动能的全球性秩序所影响和控制，而亚太地区秩序很少具有推动全球性国际秩序变革的动能。不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引发的大量讨论表明，亚太国际秩序有可能成为推动未来全球秩序变化的根本动力。展望未来十年，中国崛起显然将极大改变地区秩序，但无论是从经济力量对比，还是对规则的创新而言，中国都不可能是地区秩序的主导者。

## 一、全球性秩序转变的动力从体系性战争转向和平

---

在从朝贡秩序转向帝国主义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对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有着深切地体验。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为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推广者，且以武力作为主要手段。而对于朝贡秩序的缔造者中国而言，武力并不是理解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关键。但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更具战争能力，以欧洲为基础的西方权力迅速瓦解了全球其他地区的旧势力，推动了全球体系的形成，中国也不得不接受这种秩序的安排，并从中学习秩序的内容。中国学习西方秩序最大的一次成功是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顶住了美国的打击。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通过共产党完成了中国文明的再造，武力重新成为中国获得国际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历史上通过体系性战争转变秩序不同，人类历史最近的一次全球性国际秩序转变是通过一个大国的和平解体而完成的。从经验层面看，人们逐渐接受战争或者武力并不是改变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从理论层面看，国际秩序的转变可以不是体系层面、而是经由单元层面的变化而获得。因此，与历史上的秩序转变相比，冷战格局的解体不是以某一集团中几个国家的失败，而是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力量迅速丧失为特征。这意味着，单元层面的因素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取得冷战的胜利，全球秩序的整体性以及结构性比以往更为强大，美国这个单元主导了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当时处于这样的一个体系中。苏联解体前后，按照名义 GDP 衡量，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 6.5%，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 10.8%。<sup>1</sup>鉴于美国和日本是同盟，如果以“联盟经济”的视角看待中国所处的体系性力量，即以北美、西欧、澳新以及日本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中国显得更为弱小。在经济权力格局对比上，中国不存在平衡该体系的实力。中国只能是体系的参与者，也是体系规则的接受者。因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至少在亚太地区不存在一个足以挑战美国体系的国家，即单元层面上没有出现足以改变美国权势的平衡者。

由于美国一家独大，美国的战略总体上是维持霸主地位。从目前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依然处于“一超”位置。从理论上讲，一个单一的霸权主导国际体系时，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如果抛开感情色彩，中国主导的朝贡秩序也是一个实力对比悬殊的地区秩序，总体上也是稳定的。另外，从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军费开支占全球 GDP 的比重看，其总体趋势是下降的。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该比重已从 1988 年的 0.89% 下降至 2012 年

---

<sup>1</sup> 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92 年，中国名义 GDP4226 亿美元，美国 62618 亿美元，日本 38528 亿美元；1991 年，中国名义 GDP3795 亿美元，美国 59307 亿美元，日本 35368 亿美元。正文中数据是两年平均，数据来源于 [www.dataworldbank.org](http://www.dataworldbank.org)。

---

的 0.24%。<sup>2</sup>这意味着，全球总产出中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运用于非军事领域。从安全保障环境的巩固有利于推动经济交易而言，这个 0.65%的缩减功劳很大。

## 二、中国崛起之前的两次亚太地区秩序调整

2010 年中国名义 GDP 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崛起”成了亚太秩序转变最主要的动力，至少在单元层面上看是这样的。在此之前，亚太地区有两次比较明显的地区秩序调整，分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所引发的地区秩序变革，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前期美日关系调整带动的秩序调整。历史经验表明，挑战者以单元的姿态面对整个霸权体系的压力时，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足够的战略耐心和有益的国际战略环境。

20 世纪 70 年代初，面对苏联的进攻，国力略有衰落的美国以均势作为原则，形成了“联华抗苏”大战略，由此牵动亚太国际秩序的大调整。1971 年，澳大利亚籍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亚洲与太平洋的新均势》一文中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亚太秩序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中苏集团与美国联盟体系的对抗，发展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进入 70 年代，美国联盟体系的影响力衰退，地区秩序进入了一个相对自助的阶段。<sup>3</sup>布尔之所以说美国联盟体系影响衰退，除了中国因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经济崛起。日本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再度提出“太平洋世纪”、“亚太世纪”等构想。<sup>4</sup>从体系层面的权力对比看，在这一轮秩序变动中，经济层面变化的主要是日本而不是中国<sup>5</sup>，但在地缘政治上，中国从中苏同盟转化为美国的准盟友，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的经济融入大战略，确实是很大的变革。因此，美国主动发起这次秩序调整，综合考虑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仅打击了苏联，某种程度上也帮助美国牵制了日本。比如，以钓鱼岛问题来看，美国当时的策略是两边讨巧，对中国说“在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对日本则说将“行政权”归还。<sup>6</sup>显然，在面对苏联这个共同的威胁时，中国和日本都容忍

---

<sup>2</sup> 根据该研究所(SIPRI)网上数据库提供的军费开支数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 GDP 数据计算所得。

<sup>3</sup> Hedley Bull,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Vol. 49, No.4, 1971, pp 669-681.

<sup>4</sup> Pekka Korhonen, "The Pacific Age in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7, No. 1, 1996, pp. 41-70.

<sup>5</sup> 1967 年，日本的 GNP 是中国的将近 3 倍，是地区内排名第 3 的印度尼西亚的 15 倍。参见，Donald C. Hellmann, "The Emergence of a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ub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4, 1969. p.247.

<sup>6</sup> Kimie Hara, "50 years from San Francisco: Re-examining the Peace Treaty and Japan's Territorial Problems," *Pacific Affair*, Fall 2001, pp.377-379.

---

了美国的这种战略。在美国构建的体系中，中国、日本的经济实力都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也是中日长期接受美国安排的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秩序的变换上有潜在能力与美国竞争的是日本，日本的经济总量接近于美国的61%。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日本精英总体上倾向于做美国体系的“支持者”，而不是“挑战者”。尽管如此，日本凭借其卓越的经济能力要求形成以“日美欧”为核心的新领导体制。冷战结束前夕，日本外务省次官栗山尚一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衡量准则，即以1921年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美英日海军舰只总吨位5:5:3的比例，确定20世纪90年代初“三极共治”中日本的比例地位。<sup>7</sup>对美国来说，战胜了苏联证明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几代人奋斗四十年才成就的霸权基业，不能让日本分享这一荣耀。因此，在美日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中国因素再度成为美国平衡日本势力的考虑。1995年，美国出台新东亚战略报告。该战略不仅让日本再度确认美日同盟，也让中国继续沿着市场经济体系前进，可以说“奈报告”捍卫了美国在东亚确立的秩序。<sup>8</sup>十几年以后，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威胁已不复存在，但中国的挑战却越来越引起美国的重视，结果当年被设计用来对付日本的东亚战略，如今被解释为引导中国走向成功。当年的设计者，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向中国人回忆这一战略时，命名为“融入+对冲”，说是成功地综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因素，既防止中国打“日本牌”，也促使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经济体系。<sup>9</sup>约瑟夫·奈没有告诉中国人的是，当年的这项战略主要是为了说服日本人和美国的反对派接受美日同盟，中国在这项战略中是个配角。

亚太国际秩序的这两轮调整，对理解未来中国崛起对秩序的影响力有不少启发之处。第一，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前，在美国体系内扩大自身的实力尚不足以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第二，经济实力的增长会改变美国体系对一个地区的看法，如果美国不能使得该地区的收益增强美国体系的实力，美国倾向于削弱它。这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公开抵制日本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判断美国是否继续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美国从中所获得分配性利益是否继续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态势演进。

第三，没有政治影响力作为支撑的地区经济增长很容易招致弱化。日本曾长期作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关键在于日本通过美国体系获得“假性领导力”，即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

<sup>7</sup> 栗山的文章发表在《外交论坛》1990年5月号，关于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对新国际秩序的探讨参考林晓光：“试析日本国际新秩序构想”，《日本学刊》，1992年第4期，第18-30页。

<sup>8</sup> Joseph S. Nye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4, 1995, pp.90-102.

<sup>9</sup> 约瑟夫·奈、张哲馨：“自由主义化的现实主义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第70-73页；约瑟夫·奈：“中美关系的未来”，《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第15-16页。

---

以扩大“自由世界”的势力。但随着美国体系安全压力的降低，美国对一个在高技术领域持续发展的日本经济产生极大的疑虑，由于日本本身并没有通过经济扩散获得地区的“实质领导力”，日本在遭遇美国压制时很难获得地区的支持。对此，东亚战略的设计者约瑟夫·奈曾提到“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在国际政治秩序之上”，安全就像氧气一样重要。<sup>10</sup>

第四，在假性领导力向实质性领导力转移中，需要某种历史性机遇和自身的战略谋划能力。这种历史性机遇在过去表现为世界大战，即大规模的集团间（而不仅是两个国家间）战争重组了政治经济体系，改变了竞争规则和治理规范。而战略谋划意味着对历史性机遇的把握能力，即本国是否做好了抓住历史性重组政治经济体系的准备。由此看来，日本利用了冷战机遇，但却没能利用好冷战后机遇。日本尽管从 80 年代开始具有做政治大国的准备，但这种准备却因为冷战结束后缺乏与美国周旋的战略空间而夭折。

第五，亚太地区秩序的调整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主导全球战略的是均势原则，主导亚太秩序调整的是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平衡性把握。一般性而言，美国存在着地区战略，但没有周边战略，其地区战略服从于全球战略。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平衡苏联的影响力，美国成功拉拢中国；90 年代，为了拉拢日本，美国又将中国引入美国体系中制约日本。因此，在这两轮最终证明有利于美国的亚太秩序调整中，中日关系的性质和状态是关键，而美国对中日关系性质和矛盾的平衡性把握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如果没有日本依附，美国的亚洲战略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过来讲，对中国而言，没有日本支持的亚洲战略更难以取得成功。

### 三、未来十年亚太秩序的演进方向

在有关国际秩序转变的讨论中，多数都将经济实力的变迁视作秩序变迁最根本的动力。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美欧经济遭受重创，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显现出活力，特别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西方相对衰落态势下，中国的崛起效应被放大，有关亚太地区秩序的论辩进入新阶段，出现了以中美为中心“G2”的秩序演变态势。<sup>11</sup>中美两国政府都表示不接受所谓“G2”的称谓，而是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避免重蹈历史上新兴国与守成国的战争悲剧。但正如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

<sup>10</sup> Joseph S. Nye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4, 1995, pp.90-91.

<sup>11</sup>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FT.com*, January 13, 2009.

---

Roy) 指出的, 尽管中美两国试图创新, 但实际行动与官方声明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sup>12</sup>

引发这种差异的一项重要因素是亚太的力量对比呈现出多极态势, 在战略关系上则存在多重性。比如, 美国、日本的力量相对下降, 中国、印度的力量绝对上升。2012 年,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 中国名义 GDP 是美国的 53%, 是日本的 138%; 印度名义 GDP 是美国 12%, 是日本的 31%。<sup>13</sup>与 1971 年相比, 中印的经济地位显然上升很快; 与 1991 相比, 印度当前的地位也大大超过当年中国的地位。在战略关系上, 美国“再平衡”战略已经引发了地区关系的重组, 与前两轮调整时中国、日本围绕美国转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 此轮地区秩序调整时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平衡更难以把握。

绝大多数战略分析报告在展望未来亚太秩序时, 都将中美作为分析框架和核心, 尽管最终的结果不一定是美国主导或者中国主导。澳大利亚战略家休·怀特 (Hugh White) 认为, 未来新秩序的特征将回归 19 世纪的大国协调 (Concert of Power), 核心是美国、中国分享其领导力, 中美相互承认和接受彼此的政治体系、国际利益。在这种秩序下, 美国接受霸权的丧失, 对等地对待中国, 而中国也必须放弃很多, 比如接受印度、日本作为亚洲未来对等的力量。<sup>14</sup>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 2010 年发表的《权力与选择: 亚洲的安全未来》报告, 认为未来存在着美国主导、亚洲均势、亚洲协调和中国主导四种安全模式, 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旨在阻止霸权战争的大国协调秩序。<sup>15</sup>该报告的论点实际上与怀特的看法有类似之处, 不过该报告并不看好中国主导的模式。再比如, 日本东京财团在其 2011 年发布的《日本安全战略》报告中, 也将未来 10-20 年, 中美实力对比以及中美关系状态作为分析框架, 得出了四种安全模式, 即美国主导下的中美和谐模式、美国主导下的中美对抗模式、中美权力均衡下的合作模式以及中美均衡下的对抗模式。报告认为, 未来 20 年美国在实力上仍将压倒中国, 关系可能走向对抗性, 即第二种模式。<sup>16</sup>

鉴于日本全球第三大经济地位, 其对秩序的构想显然不同于第 12 大经济体澳大利亚。日本在前两次亚太秩序转换中, 都试图凭借其经济地位从美国手中获得一部分权力。未来十

---

<sup>12</sup> 参见 J. Stapleton Roy, “Thoughts on Strategy from a Career Ambassador”, September 5, 2012, <http://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thoughts-strategy-career-ambassador>。

<sup>13</sup> 数据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sup>14</sup> Hugh White, “Power Shift: 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Quarterly Essay*, No 39. September 2010, Black Inc, Collingwood Victoria.

<sup>15</sup> Malcolm Cook、Raoul Heinrichs、Rory Medcalf、Andrew Shearer, *Power and Choice: Asian Security Futures*,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June 2010.

<sup>16</sup> The Tokyo Foundation,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tegration, Balancing, and Deterrence in the Era of Power Shift*, Tokyo, October 2011.

---

年，印度经济仍然难以超过日本，因此日本将继续使用其强大的经济能力扩大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而美国为了防范中国独大，也将继续使用均势原则，提升日本战略地位。在 2012 年 8 月通过的第三份“阿米蒂奇-奈报告”中，美日双方都认为美日同盟是亚洲繁荣的基础，并且要求日本在今后的地区秩序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sup>17</sup>

与澳、日相比，亚洲的另一个经济崛起国印度，其外交战略显示出更强的独立自主性。在 2012 年 2 月公布的《不结盟 2.0 版》报告中，印度战略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十年，除美国外，中国、巴西将和印度一样逐步发展壮大，但俄罗斯与日本则是下降态势。报告强调，21 世纪不会重复 20 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历史，尽管中美是超级大国，但其他权力中心和枢纽也对秩序的塑造有很大作用，印度要避免成为中美冲突中的一方。<sup>18</sup>

显然，无论是美国的同盟国日本、澳大利亚，还是具有不结盟传统的印度，在未来的亚太秩序构想中都不愿意只做美国的附庸，但也都不愿意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下。因此，讨论未来十年亚太秩序时的一个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亚太经济秩序是否朝着中美两极前进？按照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的判断，“东亚正在出现可以说是两种相异的等级体系。一个是由美国主导的安全层级体系，另一个则是由中国主导的经济等级体系。”<sup>19</sup>在这段话中，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伊肯伯里对东亚的两个等级体制的分析是着眼于未来，即“正在出现”，但目前还不是完全如此。我们不应该忘记，1995 年，美国制定对日本的新东亚战略时，日本经济总量曾达到美国的 72%，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95 年日本 GDP 是中国的 7.5 倍。但 20 世纪 90 年代时从来没有人说东亚出现美日两个等级体系，或者日本主导东亚的经济等级体系。即便着眼于未来，按照 IMF 的预测，2018 年，中国名义 GDP 将占美国的 71%，届时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 2.5 倍。显然，2018 年的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在结构性上弱于 1995 年。如果说 1995 年未曾出现美日两极说法，那么到 2018 年更不应该出现中美经济两极说法。

如果时间进一步延长至 2023 年，按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基于购买力平价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sup>20</sup>如果按照 IMF 基于购买力平价的预测，中国超过美国的时间是

---

<sup>17</sup>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2012.

<sup>18</sup> Sunil Khilnani et al.,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Delhi: The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2012.

<sup>19</sup> [美]约翰·伊肯伯里：“地区秩序变革的四大核心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8 页。

<sup>20</sup>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December, 2012, p.16.



---

2017年。但是，在购买力评价意义上超过美国意义何在呢？或许中日关系是一个参照，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IMF的数据显示，中国超过日本是2002年。在2002年以后的几年中，中日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更为波动的时期。

因此，所谓中美经济两极的说法，不是从经济意义上，而是从战略意义上的一个判断。与20世纪70年代初相比，在经济意义上，中国与日本地位将互换；但在战略意义上，中国已从美国的准盟友，转变为战略竞争者。随着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态势加剧，日本将担当起以往中国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角色，即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不过，对美国而言，仅有日本还不足以防范中国崛起潜在的威胁。为此，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启动了再平衡战略，在经济上则启动了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TPP）。

TPP正是美国意图从经济上控制中国崛起进程的重大战略规划。由于中国的崛起首先是亚太的崛起，其次对全球具有影响力。因此，美国在经济上就必须设计一项兼顾地区和全球考量的经济战略，而TPP正中下怀。2009年11月，奥巴马在东京宣布美国将参与TPP谈判，当时的鸠山政权还在讨论东亚共同体，美国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美国继续作为旁观者对亚洲事务发表意见，恐怕就要被清除出亚洲。美国此次吸取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教训，开始积极参与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由于美国的参与，地区合作的核心由“东亚”逐步转变为“亚太”，自由化的目标和范围都要宽广得多。2013年7月，日本首次参与TPP12国谈判，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条约体系具备了完整的经济联系，中国仅仅通过双边关系将更加难以改善对日关系，中国周边对华的包围圈将更加完整、坚固。首先，中国以中低端制造业出口将直接受到关税水平和原产地规则的制约；其次，中国的地区经济和政治作用会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美、日在分离周边国家对华深度经济依附上有很大影响力；最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合作体系会逐渐确立。即便最终中国被纳入TPP进程，但由于美国控制规则制定，以及亚太地区最终的几个经济体已经嵌入美国的TPP体系，那么中国还将极大地依赖美国市场，增加了经济与安全的脆弱性。

因此，中国不仅需要关注美国，也需要关注亚太的其他经济势力。正如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的，“与美国在20世纪最后十年崛起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目前崛起所发生的背景不仅包括与其它大国的较劲，而且它的崛起还高度依赖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持续稳定。”<sup>21</sup>对此，严肃的中国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发展与地区形势的互动性。北京大学教授查道炯认为，关于中美新冷战的说法，至多是新闻记者的观察而非严肃的研究，中美

---

<sup>21</sup>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曼等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92-93页。

---

两国都不能忽视亚太其它国家合力维持地区稳定的决心。<sup>22</sup>为此，中国也要重视印度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的需求，要深入认识韩国在链接中国中心的亚洲与美国中心的太平洋之间所扮演的角色。

从外部环境而言，一个崛起的中国不仅得益于美国塑造的全球开放秩序，也得益于东亚独特的生产网络。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亚洲地区主义形成了独特的模式，即市场驱动、多种速度、多种轨道的一体化进程。<sup>23</sup>东亚与东南亚两个次区域是亚洲次区域内贸易最为紧密的地区，而从次区域之间的贸易衡量，则太平洋岛国与亚洲其他次区域的贸易最高，占岛国总贸易额的 60%，其次是东南亚，占 44%。<sup>24</sup>太平洋岛国的贸易主要是初级产品，东南亚的主要次区域间贸易对象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其产品主要是中间品。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随着地区内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和进一步实施，亚洲大陆的经济整合将更加强势，这不仅对美国形成压力，也对日本构成平衡的难度。因此，与前两次亚太秩序的转变取决于美国以及美国利用中日平衡不同，未来的亚太秩序必须要面对需要更多的国家参与，采用更为多元的手段。

## 四、结论

大国力量对比及其战略关系构成亚太秩序的基础。历史上的亚太秩序转变，多数时候以全球性国际秩序的转变为主要动因，而其手段主要是体系性战争。随着美国强力介入东亚事务，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之后，亚太秩序转换的核心动力就变成了中美日三方，其中美方还是主导地位，中日互为平衡，手段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平衡。

随着中国崛起，亚太地区多数国家以中国实力上升、美国相对衰落为框架分析未来十年的亚太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认为未来十年中国能够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而且按照历史上的中美日经济关系看，2018 年美中日三边经济关系的结构性要弱于 1995 年的美日中三边，因此所谓“正在出现的两种相异的等级体系”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战略

---

<sup>22</sup> Zha Daojiong,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RF/ADMM Functional Cooperation”, September 20, 2012, The Tokyo Foundation, <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topics/japan-china-next-generation-dialogue/asia-pacific-regional-security-cooperation>。

<sup>23</sup>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 Integration Monitor—July 2012*,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sup>24</sup> Ibid., p.16.

---

意义上的。

未来十年，中国将显著拉开与地区内国家的经济差距，但多数亚太中等国家，其战略界对未来秩序的构想尽管以中美为中心展开，却希望中美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中美既不单独主导地区秩序，也不破坏现有的稳定秩序。地区内国家更愿意寻求一种开放性的地区秩序，根据各自的战略利益需求，以多轨的形式、在不同的亚太次区域中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及对外战略。因此，未来十年，亚太秩序不会由美国主导，但也轮不到中国来主导，对中国而言，特别要加以重视的是，在以中美为中心的秩序框架之外，寻求更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因素与新动力。